

# 廣元市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广元市委员会 编

## 广元市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

---

川广内字第(2008)101号

860×1194mm 1/32

2008年12月印刷

---

# 《广元市文史资料》

## 编 委 会

主任 唐金林

副主任 吴万德 马喜成 严明清

委员 樊怀京 何成礼 胡月鹤

刘开明 杨晋平 何重荣

胡景寿 杨正贵

主编 杨正贵

副主编 王 敏

执行编辑 梁秀瑛

## 目 录

大华纱厂落户广元前后回忆	徐中辉(1)
记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时的前前后后	徐中辉(5)
忆童年跑警报	贯明钧(11)
起义前夕	朱兴义(13)
广元临解放纪实	徐中辉(21)
建国初期见闻二、三事	童朝俊(25)
建国初广元县安定社会秩序和县区政权建设纪实	王占钧(30)
禁烟肃毒纪实	揭纪林(34)
我在广元朝天工作的一段经历	贯明钧(38)
广元县抗美援朝情况综述	伍 锋(43)
苍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面旗帜	潘正江(50)
人民公社化前后工作片断回忆	聂绍满(53)
青川县农村公共食堂始末	黄世鳌(60)
大跃进运动亲历记	潘正江(66)
大跃进年代的曲回中学	秦光泉(70)
剑阁县文化大革命十年纪要	王守义(78)
忆我在文革初期的经历	何中辉(95)
知识青年与城镇居民上山下乡述略	黄 贤(105)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回忆	刘 宁(112)
安置城填闲散人口下乡	徐中辉(117)
旺苍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述	熊慎文(119)

---

忆工农水库修建始末	李映雪(129)
广元农村水电站发展始末	徐定全(147)
我所经历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	李映雪(151)
唤马镇助教兴学与建设教师一条街实况回忆	郁兴寿(154)
我经历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姚福田(164)
忆老部长刘成基	王炎生(176)
一等功臣张清本	李开林(187)
中外著名病理学专家陈朝伦	陈汉立(193)
忆翠云廊画人王传心先生	王守义(197)
《广元府记》碑发现记	刘永胜(204)
东晋古刹——嵐黎寺	王明河(207)
唐代公主墓调查纪实	杨滋和(209)
汉王山灵塔	杜绍才(214)
《蚕桑十二事图》碑概述	马运寰(217)
薅草锣鼓响川北	邵家仁(220)
嘉陵江号子	邵家仁(226)
米仓山童谣选录	史怀万(236)
旺苍民俗做道场	史怀万(242)
商会主席赖子乐其人	孙继先(253)
青川会道门组织的形成及取缔	李开林(257)
巴山匪首陈廷辉的起家与覆灭记	杜春秋(266)

# 大华纱厂落户广元前后回忆

徐中辉

大华纱厂为股份制合资企业，其兄弟厂分布在全国各地，如武汉、重庆、成都等地的裕华纱厂，石家庄的大兴纱厂，西安的大华纱厂。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石家庄及武汉地区相继沦陷，西安的大华纱厂又连连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致使股东们损失较大，纱厂也不能正常进行生产，办厂的董事们商讨后决定，要将西安大华纱厂的部分纺纱机器，迁至当时称为大后方的四川，于是在1939年的年初，厂方便派出了几个懂行的人员，来到广元进行选址考察，按厂方的要求，厂址必须应具有以下条件：

- (一)交通方便，至少能通汽车，以便能运输机械、原料与产品。
- (二)当地就近要有煤矿，以便发电。
- (三)要有充足的水源。
- (四)要有比较高度的山，以便在山脚挖防空洞，洞内可安装纺纱机器，发警报时亦可让职工们藏身，免被敌机轰炸。

(五)地皮价格要低。

(六)要有建厂、库房、宿舍等比较分散不太集中的地方。

经全面综合考察，广元当时虽然经济不发达，但却具有建厂的诸多条件。

城北须家河(工农乡)有煤矿，矿区紧挨公路，公路边紧靠嘉陵江(当时江面水位较高木船可运输)汽车亦可运输，水陆两路距城

约四公里。

嘉陵江有长年不断的流水，水质好，距厂址不足千米取水方便。

城内有东山，有较高的厚度，山体结构不复杂，平时山顶不积水，挖洞后洞内不会太潮湿。

当时城内空地较多，很多地方都还在种粮食，建厂拆迁户少，因此地价不高。

几经商讨后于1940年初，便决定在广元购地建厂，并进行全面进行施工建设，在施工前还专门请了风水先生，用罗盘量了龙脉，按要求挖地洞二十个门道，洞内部互相联通（代表一脉相传实实在在），对厂前的大门朝向方位也进行了精心安排，认为门不能与厂区前面的墙壁平行，而是门南柱与墙面平行，门北柱则向内退了近二公尺，这样就有了一个倾斜面，据说这样才会“后福无穷”、“后顾无忧”、“后来居上”。

为搞好征地、拆迁等工作，厂方还专门聘请了当时本地的地方势力头面人物介入此工作。

在兴建所有的房屋中，为了立足于防日机的轰炸，一律都建砖木结构的平房，这样造价低速度快。

纱厂在城内购置的地盘，约占城区内土地的四分之一，除厂区外，厂外街对面建有单身工人集体宿舍，因为当时那里无街名，又在厂的西面，因此称该处为“华西”（现中广学校以北和东邻供电局及北街小学以南地区）。

北门外（现市司法局以北，蜀门北路二段以东，广元军分区以南刘家院处）为北门仓库，以存放棉花、棉纱为主，住有少数职工家属及工人。

将军桥仓库（现城北职中以北，原广元酒厂以南）以储存机械

配件为辅，主要住宿职员及有家属的技工，虽然距厂上班较远，但都认为被轰炸的因素小，为此，当时房屋及院围墙等都涂成灰色，据说在飞机上不易被发现。

在北街豫剧团处街对面，南北长约一百米，东西宽约八十米的地方，那里原来是纱厂停汽车和修车的地方，当时叫“华运”，以后由于厂内的职工增多，便建成了宿舍区，现已被开发商买去建成了高楼群，原貌已荡然无存。

华南宿舍区是在1944年日本帝国投降后，厂里又在中广学校以东及南边新扩建的土地，并在南边修建了座北朝南东西走向，三大排，每排十套平房，统称为“华南”，由南向北订名为一、二、三里，这三十套独院住房，室内装有木地板，并有前、后院，现在看来却很一般，但在当时却是广元第一流的住房，全部分给职员居住，原住在将军桥的职员，基本上都搬到“华南”去了。

厂长的住房则建在三排平房的西边，面积相当于职员的三倍。

在纱厂内也兴建了比较正规的厂房，同时把原防空洞内的纱锭、机器等搬到了新厂房里，另外又增加了若干新设备及招收了员工。

大华纱厂建成开工后，使原广元北门很清静的地带繁荣了起来，为纱厂运送棉花的骡马车队，在蜀门北路二段西侧（原县委宿舍至广元军分区招待所处）开了五、六家骡马、停车住宿店，还有专门帮纱厂从北门仓库运送原棉及棉纱的手推“鸡公车”的人，也住在北门仓库外面一带，这种专用“鸡公车”，有别于河北、河南及川西坝子的车，外地的车，车身较矮，车轮中间部位高，货物装运在车两边，广元的车为了运载原棉（呈方形，每包重约五百市斤），车上部为平面，前后呈梯形，车身较高，木架、木轴、木轮，轮边外沿钉有汽车轮胎皮。载物推动后，木轴与木毂支架孔摩擦，能发出较特

别的吱吱扭扭声。

在冬季时，有大批骆驼也投入搬运棉花的行列，驼队的人为了节省驻店钱，常把骆驼安置在北门外嘉陵江边的沙滩上歇息，那时住在城乡的人们，很多都要到江边上观看稀奇，一时间，江边就热闹非凡。

北门内、外街道两边，饭馆旅店也应运而生，汽车响、骡马鸣，鸡公车声，打铁声，钉马掌声及叫卖声汇成一片，给当时人少的广元，增添了无限的活力。

## 记抗日战争时期 武汉沦陷时的前前后后

徐中辉

今年是武汉地区沦陷后的七十周年。七十年时间虽然短暂，但七十年前中国所遭受的创伤和日军占领区人民的痛苦往事，却常常在我脑海中翻滚。

我的老家在石嘴乡徐家村，那里距武昌城约三十公里。村子所在地的地形属浅丘，离长江边约一公里。那时江边筑有防洪堤，堤内有一个终年蓄水的湖。我家就在距湖岸边约一百米的小土坡上。湖中生有野菱藕，还有丰富的鱼、虾、蟹等。只要喜欢，随时都可在湖中采菱挖藕，捞虾捕鱼。当地村民吃鱼虾和菱藕，就如同广元农村吃酸菜一样普遍。

湖里还有黄辣丁、黄鳝、乌鱼、泥鳅、乌龟、田螺等，不过那时没有人去捕吃。人们的生活朴实而安宁。

从1948年开始，日军的飞机就常常是九架一起在天空排成“品”字形飞过。有时多达二十七架，编队而飞。只要为首的飞机尾部上方的红灯一亮，后面的机群便同时投下炸弹。一次次疯狂的轰炸，导致很多平民死伤和房屋倒塌。后来，驻扎在武汉的盟军飞机在天上与日机展开了空战。

日机飞临，就会有警报响起。一有警报，我们便就近躲在山沟或大树下。盟军飞机与日机作战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盟军飞机一上天，日机编队便会大乱，只见天上的飞机忽上忽下，左旋右

转，飞机上的机关枪也哒哒地响个不停。当我们看见日机被击中，冒着长长的黑烟坠入江里时，心里特别高兴，大家便会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经过几次交锋，日机再也不敢像先前那样猖狂了。

遗憾的是，空战中往往是敌众我寡，盟军飞机也有受伤时。一次，一架盟军飞机被击落，看着真让人落泪。这个飞行员的遗体后来被安葬在汉口中山公园内，园内还立了一块大石碑，以供人们瞻仰悼念。

随着战争的深入，日军不断从华北向华中挺进，日占区在不断地扩大。武汉地区受到严重威胁。百姓们开始远走他乡，达官显贵们也纷纷逃离。为稳定民心，当时的国民政府到处张贴布告和散发传单，告之军队中有八位军长及其所属部队要死守武汉，与武汉人民共存亡。一时里，百姓们很受鼓舞。但很快，就在当年的秋季，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武汉。

在日军先头部队进村时，村子里的人都躲进到屋里，紧闭大门。透过小窗户，我看到几个日本士兵向村里走来。见外人到来，几只狗狂吠不已。日兵举枪就射，把狗给打死了。

不一会儿，后面的日兵也到了村里。只见有的拿着大马刀，有的拿着长竹竿。他们肆无忌惮地在村子里见猪捆猪，见鸡抓鸡。一阵抢劫后，便在村口支起大锅，享受起果实来。

日兵们饱餐后，便驻进了徐姓大祠堂。从第二天起，这些日军就分别到处寻找妇女。好在我们村子里的妇女早已逃走，没有遭到蹂躏，但邻村一些未及外逃的妇女就遭受大难了。一位妇女因被奸污时受到惊吓，将大便屙在裤裆里，当场便被日本兵残忍杀害；有的妇女遭到奸污，觉得无脸见人而上吊自杀。妇女们为躲避日本兵，纷纷外逃。日本兵则开车或骑马到处搜寻。一时里，到处人心惶惶。

日军进驻前，我家便搬迁到了几十里外地名叫“野湖嘴”的深山。那里山虽不高，但却是沟壑纵横，有一个望不到边际的湖。湖面上野鸭和水鸟成群结队。日本兵偶来此处骚扰作恶，但又怕游击队的偷袭，因此只是白日里呆上一两小时后就匆匆撤走。

当时湖北农村盛行童养媳。由于担心家中女孩遭遇不测，那段时间里，许多家都草草联姻婚配。家中老小只有担惊受怕，根本顾不得体面行事。

与此同时，日军战线不断扩大，兵力也逐渐分散。驻扎在本地的日兵先头部队不久就转移走了。后来又来了新的日军。这些日本兵带有随军妓女（慰安妇），军官是单独包一个，士兵们则集体共拥。后来的日本兵为了笼络人心，以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故不再对乡民们抢掠和强奸妇女了。

我家房屋被日军住后，门前的菜地被用作马场。我们有家难回。为求生机，父亲便与几个乡亲一道，辗转去了当时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西安。这时西安也经常遭受日军的轰炸，西安大华纱厂为避战火，决定一部分迁移至四川。由于父亲原在其他纱厂工作过，还算懂行之人，因此我父亲便被纱厂招收派至四川广元建厂。

日军的长期驻扎和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日。因此日军常常在农村遭到游击队的伏击而惶惶不可终日。几个月后，日军全部驻扎到了城里。外逃的乡民们也开始慢慢回到原住地。不久我们就从野湖嘴搬回了老家。回家发现家里的便桶（湖北城乡家庭解放前多用此）中留有饭粒，猜想一定是被日军作炊具用了。想起这事来真让人开心。

由于县城相对比农村平静，回迁后我母亲和弟妹们便租居到汉阳鹦鹉洲去了。我这时需要继续在本村私塾读书，就暂时留住伯父家。

约月余，有一天的中午，在距我家约一里路的小山坡边，一个汉奸独自骑自行车路过时被游击队员发现，游击队员将其击毙并抛尸路旁。日本兵为此大动干戈。当晚半夜，用轮船上的探照灯来回扫射附近山头，连续发射数发炮弹轰击，以解其心头之恨。好在该处人烟稀少，没有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但此举却给乡邻们造成恐慌，人们匆忙逃出房屋，就近躲避。次日学校就提前放假了。于是我便去了鹦鹉洲母亲租房处。

日军龟缩在城区，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放飞大气艇在空中巡视地面。在汉阳，日军为保其自身安全，在每个街道口昼夜都设防把守。老百姓们过往都必须遭受盘查。成年人需双手捧示良民证（称拍士），并要向卫兵行九十度的鞠躬礼，经检查后才能通过。

有次母亲带着我经过岗哨时，因下雨而未收伞，日兵见状大怒，用枪托敲击母亲的伞。经旁人提示，母亲急忙将雨伞收拢，并连连表示不懂规矩，折腾了好一会，日兵才罢休。

夏季里，日军于每个街口哨所里都派有医务人员。过往的中国人都被要求注射药剂。注射卡片和良民证是路人来往之必查要件。当时也不知为何要被注射药物。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防疫；二是实验。反正那时国人只能任其宰割，不敢多言。

那段时间里，日军的大型轰炸机群，每天都会成群结队从武汉东部起飞到西面去，直到下午才飞转回来。后来得知，这些机群是去轰炸大后方的四川等地。

日军驻扎期间，对国人开设鸦片馆视而不见，一些好逸恶劳、见利忘义之人便大行其道，纷纷经营起鸦片行当。取名为某某售吸所的招牌随处可见。

日本人对居民用盐控制得非常紧。按常住户口登记，每人每月供应一斤。据说，严控是为了防止盐流入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手

里,减少他们食用和药用的可能,以尽量地削弱抗日力量。那时,凡私人携盐出境者,一经查获,都会被严惩。

父亲在广元打工,挣得薄薪汇往武汉。两地相距遥远,汇兑往往需要两三个月。平时里,我家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粗茶淡饭,仅能饱肚。有时母亲会带着我们去郊外寻些野菜,如地菜、灰菜,以及当地人称之为马屎汗、狗几尖、木心菜、茼蒿等。有时还会在雨后去林间寻找雷打菌。一年中家里很少吃到荤腥和禽蛋,孩子们也没有零食可吃,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一点肥肉。

为增加家庭收入,我们为邻居杂货铺老板贩运烟,即从汉阳买回烟与他,然后获得一点工钱。日本人盘查很严,规定每人每次只能携带两条烟,多了会被没收。小脚的母亲和年仅九岁的我,为了运回一条烟可获一升米的报酬,来回走三十多里路去辛苦一趟。尽管路远脚疼,口渴腹饥,我们也舍不得花钱买点吃喝。清晨出发,下午四五点才能回家,母亲常常挥汗如雨,看见她那疲乏的身体,我也爱莫能助。只有领到工钱后,才能看到母亲脸上的喜悦。

家里常常入不敷出,为此,母亲会在夏天时把冬季衣服找出来去典当。记得母亲和我一人提着一个大包袱去汉阳当铺的情景。中午骄阳似火,包袱在身越来越沉重。拿到当来的钱,总算家里能勉强度日。后来父亲寄来了钱,我们才去当铺收回了这两大包衣服。

由于营养不良,抵抗力差,我与弟妹们经常生病。病重在床,母亲总会跪在床前用力磕着响头,以求菩萨保佑。她的额头常常是青紫色的。母亲虽是文盲,但对人诚恳忠厚,正直守信。她那勤俭持家,不畏艰难,大爱于人的本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了我们终生受用的财富。

1941年3月,我转学至鹦鹉洲(鹦鹉洲属汉阳管辖)的公立小

学。那时日占军规定学校要教日文。每天清晨都要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旗的上方有一黄色呈长三角形的条形旗（约占国旗长度的三分之二），上面有六个黑色大字“和平反共建国”。

升完旗后，全体师生还要齐声唱歌。歌名我已记不住了，其中有几句好像是：大地涌起雄壮的歌声，激动了万里的大进军，东亚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复兴。

1941年4月，日军完全占领了新加坡后，汉阳日驻军让所有的学校、机关、团体等人员齐集到汉阳去开会。会场主席台后幕上一左一右悬挂有两个半身人头像。听大人们说，右面的是日本天皇；左面的是汪精卫。当日军和敌伪政府的官员在台上讲话时，有大胆的爱国人小声咒骂着那些汉奸。

会后，日军通过翻译向大家宣布，为庆祝日军占领新加城的胜利，停课停业游行三天。鹦鹉洲距汉阳约有十多里路。三天里学校师生不能回家吃中午饭，由有关单位发给每人一个面包。游行队伍行进时，几架飞机先后低空盘旋，边飞边扔下大量的彩色印刷传单。

我在鹦鹉洲小学上了两个多月学。后来，不甘日军奴役，母亲决定带着我和弟妹们去与父亲团圆。我们与另外几家人一道，一行40多人，经过若干周折，全家便到了祖国大后方的四川广元。

## 忆童年跑警报

黄明钧

跑警报，是御防日机轰炸，寻求安全的一种行动。抗日战争爆发，我虽年幼无知，但同大人们一起跑警报、防空袭、受惊吓，日机多次轰炸广元的情景，却记忆犹新，常迴于脑际。

家乡广元是四川北大门，地属川北重镇，有西北制造厂（阎锡山兵工厂）、大华纱厂（官僚资本企业）、陇海机器厂、上西坝、东坝飞机场以及须家河酒精厂、南街、北街、上下河街商贸繁华地段等重要目标，成为日机空袭的主要目标。1941年6月至8月，日机曾三次轰炸广元，共出动飞机81架次，投弹481枚，炸死169人，炸伤316人，炸毁房屋182间，损失达68.6万余元（法币），轰炸目标虽多有不中，但无辜百姓受苦深重，有的一家炸死炸伤数人，甚至十几人，家破人亡，那情景实在可怜。

第一次轰炸为1941年6月22日上午10时许，日机从鲁家湾上空向城内上西坝飞机场飞来，空投炸弹100余枚，同时低空向下扫射，顿时尘土飞扬，烟雾弥漫，机场跑道炸坏，炸死附近农民48人，炸伤103人。我和母亲躲在对岸河边的船头下面，在母亲身体掩护下，才幸免于难。

第二次轰炸为1941年6月29日，目标对准大华纱厂、西北制造厂、香林寺一带。我和家人躲在东山脚下防空洞，解除警报哨声过后，到现场一看，只见尸横遍地，房屋倒塌，弹片四溅，未爆的炸弹陷进了深坑，其情其景，目不忍睹。

第三次轰炸为 1941 年 8 月 29 日,听到紧急警报哨声后,我和家人及邻居们,挤乘大华纱厂的防空车,去千佛崖后山躲避。说时迟来时快,9 架日机从汉中方向飞至须家河酒精厂上空,突然变人字型为一字型向下投弹,厂房炸成残垣断壁,机器炸成废铁,炸死 38 人,轻、重伤 82 人。

不仅白天空袭,有月亮的晚上也发紧急警报,弄得人心惶惶,防不胜防。为避免飞来横祸,每次听到警报声,我都同家人一道,或去附近水神庙(即广元县丝绸厂所在地)防空洞,或到我家后门城壕防空洞,或去皇泽寺石窟、杨家岩煤矿躲防,形同逃难,非常狼狈。那时城北城东及城郊南段的城墙下面,虽只有 276 个简陋的防空壕,大华纱厂用砖石构建的约 1379 米坑道式防空洞,但在日机狂轰乱炸广元时,却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

日机轰炸广元县城时,全城上下,老老小小都处于水深火热,极度恐慌之中。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百业凋零,时时都提防着日机轰炸。当时政府当局,为防日机轰炸,怕狗叫,不准养狗;怕暴露目标,禁止穿白、红色衣服;怕扰乱民心,不准乱贴标语。跛足伪县长汪一能杵着手杖,带队四处巡查,发现乱作为者,一律严惩不贷。好在我有城乡两处住地,空袭紧张时,我随家人到乡下读私塾;空袭缓和时则住城里上小学。好不容易熬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才结束了紧张的流浪生活。